

王

WANG

晓

XIAO

明

MING

自

选

集

王 晓 明 著

跨

世

纪

学

人

文

存

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跨世纪学人文存

王

晓

明

自选集

王晓明 著

“九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

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跨世纪学人文存
王小明自选集
王小明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邮政编码:541001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)

桂林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89×1194 1/24 印张:13 插页:2 字数:300千字

1997年9月第一版

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3500册

ISBN 7-5633-2485-2/I·220

定价:(平)24.00元
(精)32.00元

出版说明

一代有一代之学术，一代有一代之学人。学术所依托者，学人也。学人须由学殖养成，非纯由天资铸就。学殖者渐，天资者顿，而学术的规律是“渐”的。基于这个“渐”的规律，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，以助成学术之进步。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。

新时期(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)以来，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。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，受过“西风”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，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，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。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，继而渐趋成熟。90年代以来，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，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。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，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。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。因为一个民族，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，尚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、合理的解释与肯定，那便是崩溃的开始。学人的使命，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。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。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，是可堪忧心的问题。

《诗》云：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！”中国这一批新学人，多是这样的“心忧”之人，当其激切之初，曾蹈厉

于良知的煎迫；当其冷静之余，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。这样的“心忧”，是学界的好传统，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。他们的学术自选集、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。我们出版这套丛书，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。

“跨世纪”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，并不是说未被列入“跨世纪”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。“跨世纪”只是意味着，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，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。没有这样的自觉，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，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。丛书收入的，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，我们想：人类存在的价值，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。

90 年代的沉潜，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，这样的转型是承前、也是启后。在这个重要的时期，我们出版这套“跨世纪学人文存”，旨在尽我们的薄力，倡学术之昌明。

是为说明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
一九九七年九月

自序

这是我的第一个批评文选。它收入8篇较长的论文,分别是选自我的5本著作;还有1个附录,由4篇序、跋和答问组成。最近10年间,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用力较多、写得也还有一点特色的文字,大半都在这里了。

出版社来邀请出文选,我自然是高兴的。这说明还有读者愿意看我的文字,至少是出版社相信还有这样的读者。可是,我兴冲冲搬出历年的著作,仔细翻检之后,却发现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,够格的文章就那么几篇,先前的高兴就又一下子消散了。我今年40岁,自1981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,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上,已经努力了14年。我知道自己才智平平,笔又很慢,所以从不敢以成果的丰硕自期。但是,14年过去了,可以点视的收获竟这样少,我还是感到某种意外。这些年来,自问并不曾有所懈怠,一直是尽心尽意,想把文章写好的,为什么结果却是这样呢?80年代初,我刚开始写批评文字的时候,面对满目的荒野,我曾经是那样地暗暗自信: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,这荒野上一定会竖起大片的茂林。可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样的自信却似乎日渐退缩。前不久与友朋夜谈,我竟至由衷地发问:我已经写下的这些文字,是否还值得年轻一代人去阅读?即如我自己指导的博士生们,是否真能从我的著作中获得启发?友朋自然是劝慰我的,我私心也并不真愿意相信事实就是如此。但是,那个疑问却一直伏在我的心底,这一回编文存时的

种种感想，就又将它引出来了。

我现在还不能全面地回答这个疑问，倘若我的文字真是那样地容易速朽，恐怕就一定有一些个人无力把握的原因。但是，我想在这里说说我自身的缺陷，这几年来，我对其中的一些，是看得愈益清楚了。首先是学养上的单薄。像我这个年龄的人，在知识的储备上多半先天不足；再加上环境的动荡和心情的浮躁，我对这储备的后天的追补，也每每流于片面。我最近的一本文集出版后，有位同事对我说，我看你的学术视野中还有盲区，特别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……我自己想想，恐怕这盲区还不止他说的这两块。既在学养上有如此重大的欠缺，要想写出较能持久的文字，自然是非常困难了。其次是心境上的偏狭。或许是因为天性，也由于现实的刺激，我似乎至今也还没能养成平和通达的学术心态。愤怒，悲哀，失望，怀疑，常常都是这一类情绪酿成我提笔作文的冲动，我对研究题目的选择和构造，也常常会受到现实感受的有力牵引。可能是太拘执于自己的经验了吧，我甚至都不相信那种“价值中立”的提倡有什么意义，一个人文学者，怎么可能将学术和人生区分得那么清楚呢？当然，我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对这一类提倡的怀疑，但我却更愿意相信，单是为了深化你对人生意义的探究，你也必须超越一己的心绪，只有心胸开阔的人，才可能深入地把握自己的生存经验，而这样的探究和把握，不正是人文学术的精髓所在么？也是在不久前，一位朋友指出我的批评文字常囿于单一的价值立场，这限制了我“走向博大”。我深深地感谢他的提醒，心境的紧张和不从容，以及由此造成的主观和偏狭，确实是我的一大缺陷。

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，就是认同上的失据。这两年间，我积极参加“人文精神”的讨论，再三强调当代中国文化人的价值空虚，甚至由此去反省整个现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缺失，这种种努力背后，其实都有我个人的经验在起作用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自己正是一个精神上失了根底的人，一个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四顾茫然的人。我当然知道人离不开对某个精神价值的认同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也确曾把历史进步的规律看作生存的意义所在而活得信心十足，充满希望。可是，种种经历，却实在使我无法再像先前那样相信那个历史进步和现代化的“规律”，这曾经高悬在我心中的太阳，现在是无可挽回地坠落了。不用说，一个陷在这

样的精神黑暗里的人,一个因此对自己的生命意义深感困惑的人,他的心境怎么可能从容呢?对人文学者来讲,那种不受世嚣干扰的沉稳的心态,那种聚全力于一个方向上的持久的冲劲,更不要说那种独辟蹊径的锐利的眼光,那种能够将逻辑推进到底的坚强的心力了,它们不都是来自你对精神价值的全身心的认同,来自你在生存意义上的执拗的追索吗?我曾经反复回味自己的人生感受,而愈益相信,我对某一类型的文学和音乐的敏感,大概正是我精神上最可信赖的东西。我由此想起了蔡元培当年对“美育”的倡导,我甚至暗暗地计划,要向诗和艺术中去汲取构造生存意义的最初的灵感,它完全可能成为照亮我精神黑暗的第一线曙光。但是,到目前为止,这曙光尚未升起,我对生存意义的重新探索,基本还停留在出发点上。我想,局限我的学术工作的最大的障碍,就我自己这一面说,大概就是这精神探索的迟缓乃至停顿吧。

写下上面这些自我检讨的文字,心情反而似乎有些轻松。在学术上,我对自己一直抱有期望,我现在依然想保持14年前的那份自信。我甚至依旧愿意相信,我们这一代人将会在中国学术的长途中刻下自己的脚印,它们将足够醒目,使后来者即便另觅他途,也还要走近来看上一眼。不用说,我希望在这些脚印当中,也能有我自己的那一枚。当然,在现在这样的时候说这些话,可能是过于自大了,但在我,常常却正是靠这一点固执的自期,才能不断地反省自己,并且尽现有的能力去超越自己。虽然已经40岁了,前面毕竟还有一段时间;倘按照另一种特别的计算,说因为被“文化大革命”耽误了10年,我们的年龄还可以减去10岁,那就更有努力的余地了。心中存着一个固执的期望,前面也确实还有时间,又因为这编选集的感想的刺激,似乎初步看清了自己的缺陷所在——正是这样的或许可以称之为轻松的心情,使我不禁地就要写下这些零乱的反省,并且不惮于公布我那过分的自期。

1995年11月 上海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自序..... | (1) |
| 双驾马车的倾覆——论鲁迅的小说创作..... | (1) |
| 鲁迅的最后十年..... | (37) |
| 一 驱逐“鬼气”..... | (37) |
| 二 女人、爱情和“青春”..... | (43) |
| 三 没完没了的“华盖运”..... | (55) |
| 四 局外人的沮丧..... | (62) |
| 五 一脚踩进了漩涡..... | (73) |
| 六 新姿态..... | (81) |
| 七 “还是一个破落户”..... | (93) |
| 八 “横站”..... | (100) |
| 九 《死》..... | (112) |
| 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 | |
| ——论茅盾的创作生涯..... | (129) |
| “乡下人”的文体与“土绅士”的理想 | |
| ——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..... | (161) |
| 过于明晰的图景 | |
| ——论张天翼的小说创作..... | (181) |
| 面对垂死的社会 |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论沙汀的小说创作..... | (201) |
| 在两个世界背后 | |
| ——论艾芜的艺术个性..... | (219) |
| 一份杂志和一个“社团” | |
| ——重评“五四”文学传统..... | (249) |
| 《刺丛里的求索》序..... | (269) |
| 《鲁迅传》二题..... | (284) |
| 答黄子平问..... | (288) |
| 答《批评家》杂志问..... | (295) |
| 主要著述一览表..... | (299) |

CONTENTS

| | |
|---|--------|
| Preface | (1) |
| The Overturn of Carriage and Pair; Lu Xun's Fiction Writing | (1) |
| The Last Ten Years of Lu Xun | (37) |
| I . The Banishment of Despair | (37) |
| II . Woman, Love and "Youth" | (43) |
| III . Endless Misfortune | (55) |
| IV . Depression of an Outsider | (62) |
| V . Again Into Whirlpool | (73) |
| VI . New Attitude | (81) |
| VII . Still "an Old-fashioned Man" | (93) |
| VIII . Standing Sideways | (100) |
| IX . Death | (112) |
| A Boat in Storm; Mao Dun's Literary Career | (129) |
| Rural and Urban; Shen Congwen's Fiction Style | (161) |
| An Overdistinct World; Zhang Tianyi's Stories | (181) |
| Facing the Declining Society; Sha Din's Novels | (201) |
| Two Worlds; Ai Wu's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| (219) |
| A Magazine and a "Society"; Recriticize the "May 4" Literary Tradition | (249) |

The Preface of "Hunting in Brambles" (269)
Preface and Postscript:Biography of Lu Xun (284)
The Secret between Writer and His Writing (288)
A Reply to "Critic" (295)

Catalogue of Main Works (299)

双驾马车的倾覆

——论鲁迅的小说创作

说到鲁迅的小说创作^①，我很自然会想起两个积存已久的疑问，一是他最初为什么要写小说，二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写了。对于第一个问题，鲁迅自己作过明确的解释，说是为了用小说来改良人生，^② 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，“提出一些问题而已”，他还紧接着补充说，“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”^③。鲁迅是那样一个执拗的启蒙主义者，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，应该说也很自然。可是，他分明又懂得文学的审美特性，早在1907年，就说过文学与“个人暨邦国之存”，其实是“无所系属”的话。^④ 后来他更一再强调，“好的艺术作品”，多是“不顾利害，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”，^⑤ 艺术家“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”，不必“以意为之”^⑥。这就奇怪了，既然他知道文学创作不能太功利，为什么又要那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呢？至于第二个问题，他也有过多次说明，先是认为现实过于黑暗，自己有些“疲倦”

① 这里是指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，不包括《故事新编》，因为在我看来，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作品，而更像是寓言和杂文的混合物。

② 鲁迅：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，《南腔北调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83页。

③ 鲁迅：《英译本〈短篇小说选集〉自序》，《集外集拾遗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，第418页。

④ 见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的第三节，《坟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，第51页。

⑤ 鲁迅：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，《而已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11页。

⑥ 见鲁迅1935年2月4日致李桦信，《鲁迅书信集（下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，第746页。

和“颓唐”，提不起精神来；^①后来又说是行动受到限制，不能“各处走动”以获取灵感和素材；^②在一封给报馆编辑的回信中，他更干脆归因于琐事太多，匀不出“整段的余暇”来从容构思，^③等等。这些回答都各不相同，反而使人增添疑惑，究竟哪一个才是主要的原因？或者这些都不重要，真正的原因他根本就不愿意说？

要想看清楚鲁迅的小说创作，看清楚他这创作的成败得失，看清楚他究竟是不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，我恐怕都得先来解答这两个疑问。

在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上，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是矛盾的，即便你已经形成了某种明确的理智认识，也还会获得许多模糊的情感体验。你可以用理智解释其中的某些情感，却一定还有更多的部分，远远超出你理智解释的范围。它们迟早会在你心底暗暗地发酵，使你禁不住要对自己的理智发生怀疑。倘若你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的人，这种认识上的矛盾就会更其尖锐。因为天性热烈，你那些得到了解释的情感就不会逐渐淡漠，它们反而会愈益强烈，明显地加固你理智认识的壁垒；可同时，你那敏感的气质又会大大增强那些你无法解释的情感的刺激力量，使它们最终汇聚成对理智的更猛烈的冲击。我觉得，辛亥革命以后的鲁迅，正是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人。与同时代许多天真的知识分子不同，他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一开始就很强烈，他发现革命不过就是革掉了一根辫子，“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”。^④他当然能依靠向来就有的启蒙主义信念，解释清自己的一部分失望：政治革命所以夭折，正说明思想启蒙还太不够，“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”，^⑤这才能彻底铲除封建黑暗的老根——从强烈的失败感当中，他的确是成功地激发出了新的呐喊冲动，还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诞生之前，他就已经暗自酝酿要刻画“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”了^⑥。但是，这仅仅是鲁迅内心活动的一个方面，他的思绪远比这复杂得多。对一个陷入失败情绪的战士来说，敌垒的坚固

① 见鲁迅 1927 年 9 月 25 日致台静农信，《鲁迅书信集（上）》，第 162 页。

② 见鲁迅 1933 年 8 月 1 日致胡今虚信，《鲁迅书信集（上）》，第 395 页。

③ 见鲁迅 1933 年 8 月 3 日致黎烈文信，《鲁迅书信集（上）》，第 396 页。

④ 见鲁迅 1918 年 8 月 24 日致许寿裳信，《鲁迅书信集（上）》，第 18 页。

⑤ 见鲁迅 1925 年 3 月 31 日致许广平信，《两地书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，第 24 页。

⑥ 鲁迅在《〈阿 Q 正传〉的成因》中说，在他写出这篇小说之前，阿 Q 的影子就已经在他心中有好几年了。见《华盖集续编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，第 147 页。

往往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无能，他对敌手那骄横气焰的痛切感受，是几乎必然要发展成对自己的深切反省的。而以鲁迅此时的眼光来看，他自己也的确有值得反省的地方。比方说吧，他一直倡导要做“勇猛无畏”、“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”的斗士，^①可他心里很明白，自己并不能真正做到勇猛无畏，单是为了尽孝道，他就已经牺牲了婚姻；出于现实的生计考虑，他更不得不放弃绍兴的教职，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去谋取一个官职^②。鲁迅当然不是书呆子，他知道在险恶的环境里，任何斗士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妥协。但是，这些并非不重大的妥协本身，还是会使他对自己产生某种失望，从他对《二十四孝图》的切齿诅咒，到他在北京时的屡屡以“官”自称，你都能感觉出这些妥协对他的强烈刺激；他甚至会由此产生某种自我轻视的情绪，那种不眠不食，“故意拼命做”的生活方式，那毫不顾惜自己身体的长时期的纵酒与吸烟，就都是明显的例子。^③我甚至觉得，他那肩住黑暗的闸门，与黑暗一同沉没的牺牲精神，也与对自己的这种失望有关。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，总是以他对自己作为启蒙者的信心为基础的，一旦这种信心发生动摇，他就会对整个启蒙的理想发生怀疑。因此，鲁迅对自己的失望，必然反过来加剧他对整个社会前途的悲观，连自己这样与黑暗誓不两立的人，灵魂里都还布着黑暗的影子，那彻底扫除国民劣根性的日子，真不知哪一天才能到来。你看他那“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”的论断，^④不就体现出一种隐约的沉痛的自责，一种对在中国进行启蒙的不自觉的怀疑吗？这种怀疑当然是模糊的，鲁迅的理智并不愿意接受它。可是，也惟其模糊，它对鲁迅情感的刺激就格外强烈。看看他这时候的日记吧，1913年10月他写道：“无日不处忧患中，可哀也。”1916年夏天又记道：“作札半夜，可悯！”到了1917年的除夕之夜，他更写下了这样的字句：“夜独坐录

① 见鲁迅《文化偏至论》，《坟》，第36页。

② 可参看鲁迅1910年和1911年与许寿裳的通信。尽管事出有因，鲁迅对自己在教育部任职这件事，始终感到不快，“五四”以后他屡次说自己“是一个官”，语气间便流露出明显的自嘲意味。

③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，可参见钱理群所著《心灵的探寻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）中的第五章。

④ 鲁迅：《通讯》，《华盖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，第18页。

碑，殊无换岁之感。”^①鲁迅是个深沉内向的人，越是那种模糊和软弱的情感，他越不愿意宣示于人；即便记日记，也总是简洁地实录杂事，绝少有抒情性的表白。可是，就在这备忘录式的日记当中，接连出现了上述那样凄苦悲愤的文字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在北京宣武门外那座植有老槐树的院落里孤灯独坐的鲁迅，心头是积盈了多少复杂而又深沉的悲哀！

在某种意义上，诗人都是被逼出来的。即便你本来并不想献身艺术，一旦陷入了某种不能自拔的情感漩涡，用别的方式又无法排遣，你恐怕都会情不自禁地投入艺术创作，借抒情来缓解激情的重压。对鲁迅这样艺术禀赋相当优异，天生就具有审美悟性的知识分子来说，艺术创作的自我平衡作用就尤其明显，它不但能缓解他的痛苦，更能帮助他在抒遣痛苦的过程当中，逐步获得对这痛苦的理解。因此，无论鲁迅是否自觉，他心头积盈的那份悲哀，迟早会将他送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那在静夜里孤独苦思的心境，正是孕育一个抒情诗人的适宜的温床。当然，这抒情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可以是直接宣泄现实的苦闷，也可以转向记忆和幻想，用另一个充满诗意的境界，把自己从这苦闷中吸引出来。从鲁迅后来的情况看，他似乎常常采用后一个方法，每当现实的苦闷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，他都会不自觉地转向过去，以对往昔印象的重新描绘，来缓解阴郁情绪的沉重压力。因此，鲁迅在1911年冬天会写出《怀旧》，就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这篇小说中有不少漫画式的讽刺描写，但其选材和基本的叙述语气，却使人很容易会联想到后来的《朝花夕拾》。它的文言句式也很说明问题，就像这题目所暗示的，惟其是到记忆深处去淘取慰藉，并无其他的功利意图，以鲁迅从小接受的古典文化修养，他才会那样自然地使用习惯的文言句法。鲁迅自己似乎并不怎样看重《怀旧》，甚至不把它收入自己的《集外集》。可是，我从今天的读者的眼光来看，却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，它证明了鲁迅最初为什么要写小说，他实在是不堪忍受那一份悲哀和苦闷的重压。

但是，鲁迅又没有顺着《怀旧》的思路继续往下写，他搁笔了，一搁

^① 见鲁迅1913年10月1日、1916年7月18日和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，《鲁迅日记（上卷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，第64、196、231页。